

韩国历代诗学文献总说

张伯伟

古代东国之人素好读书,所读又多为汉籍,^①所以历史上汉诗学也颇为发达,用朝鲜时代洪万宗的话说:“我东以文献闻于中国,中国谓之小中华。盖由崔文昌致远唱之于前,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。”^②故知其“以文献闻于中国”的实际内容主要是诗学。洪氏又指出:“东方诗学,始于三国,盛于高丽,而极于我朝。……虽比之中华,未足多让。”^③所以清代王士禛乃有“果然东国解声诗”^④之褒奖,纪昀则有“吟诗最忆海东人”^⑤之赞叹。诗学一词,大判而言,可分为创作与评论两途。本文综述韩国历代诗学文献,主要偏于评论一面。兹将有关文献区分为七类,简述如下。

一、诗 话

诗话起于中国,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,其形成可以追溯至钟嵘《诗品》,甚至于《诗经》中的某些诗句,^⑥但严格地讲,诗话的成立只能以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的出现为标志。韩国最早的诗话出现于高丽朝,姜希孟《东人诗话序》称:

吾东方诗学大盛,作者往往自成一家,备全众体,而评者绝无闻焉。及益斋先生《栢翁稗说》、李大谏《破闲》等编作,而东方诗学精粹得有所考。^⑦

现在能够考知的高丽诗话,计有四种:即李仁老《破闲集》、李奎

报《白云小说》、崔滋《补闲集》和李齐贤《栢翁稗说》。其中《白云小说》非自撰，是后人从《东国李相国集》等书中辑出，不尽可信。^⑧欧阳修写作诗话，其目的是“以资闲谈”，态度是轻松而随意的。高丽时期的诗话，从书名上可以看到对这一传统的继承。崔滋《补闲集序》指出：

李学士仁老略集成编，命曰《破闲》。晋阳公以其书未广，命余续补。强拾废忘之余，得近体若干联，或至于浮屠儿女辈，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，其诗虽不嘉，并录之。^⑨

其卷上也自述本书“欲集琐言为遣闲耳”，这就奠定了韩国诗话的基本写作态度，以见收于赵钟业教授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的百余种著作而言，书名中此类字眼屡见不鲜。如《谏闻琐录》、《遣闲杂录》、《晴窗软谈》、《玄湖琐谈》、《闲居漫录》等，这些著作在体制上与笔记杂说也更为接近，反之，真正以诗话为名的著作仅四十种。

朝鲜时代徐居正的《东人诗话》二卷是韩国历史上第一部以“诗话”命名的著作，上距《栢翁稗说》有一百四十多年。诗话而以“东人”名，不仅在于其所论多为东人之诗，论者为东国之人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对于东方诗学（文学）的自觉意识。《东人诗话》之外，他又编了《东文选》一百三十卷，其《序》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：

……代各有文，而文各有体。读典谟，知唐虞之文；读训诰誓命，知三代之文。秦而汉，汉而魏晋，魏晋而隋唐，隋唐而宋元，论其世，考其文，……而亦概论后世文运之上下者矣。近代论文者有曰：宋不唐，唐不汉，汉不春秋战国，春秋战国不三代唐虞，此诚有见之论也。……是则我东方之文，非宋元之文，亦非汉唐之文，而乃我国之文也，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。^⑩

所以，《东人诗话》乃得到“自有诗话以来，未有如此精切者”^⑪之

评。欲以东国之诗与中华之诗相媲美，也成为此后诗话作者的写作动机之一。朝鲜时代是诗学极为发达的时代，据《韩国诗话丛编》收录的百余种诗话看，除四种为高丽时代，三种为中国资料，一种为当代人所作外，其余都出于朝鲜时代。而洪万宗所编的《诗话丛林》四卷，可以说是最早的韩国历代诗话选编。据其《序》所称：

……吾东方诗道，自殷太师始，其后作者代各有人，往往自成一家，而独评诗者甚罕，评而可观者亦无几。如丽朝《白云小说》、《栢翁稗说》，我朝《芝峰类说》、《于于野谈》等书，不过数十种而已。余闻无不求，得无不览。第于其间并载朝野事迹，闾巷俚语，编帙浩汗，难于记览。于是合诸家所著，而专取诗话，辑成一编，名之曰《诗话丛林》。……我东方诗学之盛，斯可见矣。^⑫

此序写于崇祯玄默执徐，实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（1712）。用明代纪年，反映了明末清初一批朝鲜士大夫的普遍心理。^⑬中国古代将历代诗话汇编成集，始于明人，但在后代较有影响的是何文焕的《历代诗话》，其书编于乾隆庚寅（1770），相较而言，洪氏书早了近六十年；《诗话丛林》之末，又附洪氏《证正》，对入选诗话的内容加以辨证，较之于《历代诗话考索》也同样早了近六十年。此书的编纂宗旨略同于徐氏《东人诗话》，观其序言，语句多袭姜希孟《东人诗话序》，即可知彼此关系。其夸耀东方诗学之心，跃然纸上，故颇受时人的赞扬。如任埈《题诗话丛林后》便将之与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、胡应麟的《诗薮》相提并论，以为“继武并驾，亦足夸示中华，以东国之多诗人。”^⑭虽然如此，洪氏此书也实有可议处。主要在于其编录工作眼光过于偏狭，唯取其有关本国诗歌的评论部分。这样，大量有关中国诗人、作品的评论，有关中韩诗歌比较的评论都被刊落。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，其价值受到了不少影响。洪氏以后，类似的诗话选集还有任廉《旴葩谈

苑》八卷，内容与《诗话丛林》一脉相承。只是在原书的基础上，增加了《左海哀谈》、《枫岩辑话》、《梅翁闻录》、《二句录》、《小华诗评》、《清脾录》及自撰的《蟾泉漫笔》，其编纂凡例也照录《诗话丛林》。

当代韩国学者中对诗话文献用力最勤者，是忠南大学校的赵钟业教授。其编纂的《韩国诗话丛编》十七卷，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韩国诗话资料集。赵氏编纂诗话，着眼于广义的诗话定义，所以将论诗诗、选集、文集、笔记中的资料也尽量收入。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则其书尚多有可补充者。如南公辙的《日得录》、李玄圭的《诗话》、李燁的《诗林琐言》、金泽荣的《杂言》等，体制和内容实为诗话。又如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所藏《海东诗话》，与《韩国诗话丛编》所收四种《海东诗话》皆不同。又东洋文库所藏《见睫录》，美国柏克莱大学远东图书馆所藏《海上清云》，亦属诗话，或可增补收入。

韩国诗话的内容，可分作理论批评和实际批评两类。从理论批评的角度看，无论是诗的基本观念，诗的体制和作法，诗的美学趣味，都可以视为中国传统诗学的延伸。如曹伸在《谏闻琐录》中评论高丽以来的诗人，使用的风格概念就是浑厚、沉痛、工致、豪壮、雄奇、闲适、枯淡等，洪万宗《小华诗评》则使用了悽惋、寒苦、纤巧、清广、老熟、典丽、古朴、高洁、奇逸、邈达、奇妙、锻炼、感慨、神妙、浏亮、富丽、悽切、奇壮等概念，不难发现其与中国诗学的承继关系。从实际批评的角度看，又可根据其批评对象分作三类：即专评本国，专评中国，兼评中韩。所以，这些文献对于研究韩国诗学、中国诗学以及中韩比较诗学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。

二、文 集

根据李圣仪、金约瑟所编《新罗·百济·高句丽·罗丽艺文

志》的记载，在三国时代，已有若干种文集，可惜无一留存至今。现在所存最早的文集，是崔致远的《桂苑笔耕集》和《孤云先生文集》，他是海东汉文学之祖。^⑮从统一新罗时代到高丽朝，文风渐盛，“以人文化成，贤俊间出。……声明文物，粲然大备。……汉文唐诗，于斯为盛。然而古今诸名贤编成文集者，唯止数十家，自余名章秀句，皆埋没无闻。”^⑯据韩国民昌文化社刊行的《高丽时代汉诗文学集成》，所收高丽时人的文集约四十种，又有释家著述约十种。所以现存的文集，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作品。韩国历代文集的数量很多，如《韩国文集丛刊》两百册，收录文集六百五十九种；至于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》三千册，计划到1999年出齐，略以一种一册为计，便达三千种，超过了《四库全书》集部的数量。在序跋、尺牋、杂说、专论及论诗诗等体裁中，包含了大量的诗学文献。

在所有的文献中，文集所占的位置应该是最值得重视的。上一节谈到的诗话，其实有不少就是从文集中别裁而出的，如许筠《惺叟诗话》之于《惺所覆瓿稿》，姜沆《诗话》之于《睡隐集》，梁庆遇《霁湖诗话》之于《霁湖集》，李植《学诗准的》之于《泽堂集》，金昌协《杂识》之于《农岩集》，申靖夏《怨庵诗评》之于《怨庵集》，金春泽《论诗文》之于《北轩集》，申景濬《诗则》之于《旅庵遗稿》，申昉《诗话》之于《屯庵集》，李德懋《清脾录》之于《青庄馆全书》，成海应《兰室诗话》之于《研经斋全集》，都是如此。而且正如上文已指出的，文集中还有一些尚可裁出的诗话，兹不赘。

序跋作为文体来说，有引发作者之意及因文而见本的作用。如果序跋的对象与诗学有关，则其中必然包含评论的内容。韩国溯上古典研究会编辑了《韩国序跋全集》八大册，近一千七百篇，汇聚了不少资料。但尺牋、杂说、专论及论诗诗的资料，则尚未有系统整理。韩国古文献研究会曾经编过《韩国古典批评论资料

集》，收集了较多的资料，可以参考。

文集集中的论诗诗是重要的诗学文献。与中国的论诗诗相比，韩国的论诗诗在诗体上并不以绝句为主，^①而是古律绝兼有。如李奎报《论诗》曰：

作诗尤所难，语意得双美。含蓄意苟深，咀嚼味愈粹。意立语不圆，涩莫行其意。就中所可后，雕刻华艳耳。华艳岂必排，颇亦费精思。揽华遗其实，所以失诗旨。邇来作者辈，不思风雅义。外饰假丹青，求中一时嗜。意本得于天，难可率尔致。自揣得之难，因之事绮靡。以此眩诸人，欲掩意所匮。此俗寢已成，斯文垂堕地。李杜不复生，谁与辨真伪。我欲筑颓基，无人助一簣。诵诗三百篇，何处补讽刺。自云亦云可，孤唱人必戏。^②

这一方面表现出李奎报重视语意双美的审美观念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高丽诗坛的面貌。又如朝鲜时代的诗人申纬在《论诗为锦龄、荷裳二子作》中写道：

学诗有本领，非可貌袭致。诗中须有人（昆山吴修龄乔论诗语），诗外尚有事（东坡论老杜语）。二言是极则，学者须猛记。诗人贵知学，尤贵知道义。坡公论少陵，是其推之至。青袍最困者，自许稷契比。是以尚其事，关系诗不翅。因诗知其人，亦知时与地。所以须有我，不然皆属伪。今人自忘我，区执唐宋异。是古而非今，妄欲高立帜。不能自作家，一生廊庑寄。故自风人始，博究作者秘。不必立门户，会心三是视。辅以学与道，役言而主意。主强而役弱，有令无不遂。随吾性情感，融化一炉锤。力量之所及，鲸鱼或翡翠。锻炼到极致，自泯今古二。尽得风流后，了不著一字。王官廿四品，此其尤精粹。……金针岂在多，二言拈以示。^③

这首诗最能反映申纬的论诗宗旨。所举二言，一出于吴乔，论诗宗唐；一出于苏轼，乃宋诗代表；而“役言而主意”云云，又出

于金源诗人周昂。²⁰但申氏决不此疆彼界，画地为牢。他强调的是，既有真实的感受，又有崇高的胸怀，再辅以广博的学识。这也正是中国诗学的精华所在，而能为申纬所体悟领会，无怪乎他成为李朝诗人中的最高代表。²¹韩国历代文集中论诗诗的数量很多，除了以“论诗”、“学诗”为题者外，还有大量以“读某某诗”为题者，应该得到研究者的进一步重视。

文集中的一些杂说和专论，往往有较强的理论色彩，其价值超过诗话。如欧阳修提出诗“穷者而后工”的观点，车天辂、张维、金锡胄都写了《诗能穷人辨》；自沈约以下，声律论问题也有争议，崔炳哲《诗声律辨》、金世洛《治诗律说》也讨论了此一问题。再如洪圣民的《以学为诗说》，洪奭周的《原诗》，柳应斗的《为文贵有法象说》，金万英的《诗学发挥》等文，都试图对诗学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论说明。如果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在汉文化圈的范围中考察的话，对这些文献也是不应忽视的。

三、笔 记

笔记和诗话在文体上有时很难区分，如果说，中国诗话可以大致根据章学诚的意见，分为“论诗而及事”与“论诗而及辞”²²两类的话，那么，韩国诗话绝大多数是属于前者的。因此，在体制上，它与笔记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。朝鲜时代洪万宗所辑《诗话丛林》，就收录了《白云小说》、《栢翁稗说》、《慵斋丛话》、《秋江冷话》、《谏闻琐录》、《思斋摭言》、《龙泉谈寂记》、《遣闲杂录》、《稗官杂记》、《松溪漫录》、《五山说林》、《月汀漫录》、《晴窗软谈》、《山中独言》、《於于野谈》、《终南丛志》、《谿谷漫笔》、《水村漫录》、《玄湖琐谈》等笔记，今人赵钟业教授所编《韩国诗话丛编》收录的诗话，也有近四十种属于笔记。如果根据《朝鲜图书解题》的分类，这些笔记分别归入史部的纪事类、野乘类和子部的随录类，并非集部的题评类（相当于诗文评类）。²³因此，从

更广泛的笔记范围中搜讨诗学文献，也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韩国笔记甚为丰富，诚如李源命《东野汇辑序》所说：

我东稗说，作者接武，各随闻见，搜辑成书。诸家之名目，帙帙鳞鳞，片辞琐录，滔滔一辙。^②

笔记有的散见于文集中，也有汇为一编者，主要收录在《稗林》和《大东野乘》中。笔记在诗学文献上的重要性，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相当的关注，然而从全面网罗此类文献的要求看，还有进一步的工作有待完成。例如，《韩国诗话丛编》收录的从笔记中辑出的资料，有九种是存目，其中五种是因为与《诗话丛林》相重复。事实上，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，《诗话丛林》的辑录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例如，成伋的《慵斋丛话》共十卷，《诗话丛林》只是辑录了其中的三十二则，颇多遗漏，即使有关其本国诗歌的评论资料也是如此。兹举一例如下：

我国文章，始发挥于崔致远。致远入唐登第，文名大振，至今配享文庙。今以所著观之，虽能诗句而意不精，虽工四六而语不整。有如金富轼能赡而不华，郑知常能晔而不扬，李奎报能押韵而不敛，李仁老能锻炼而不敷，林椿能缜密而不关，稼亭能的实而不慧，益斋能老健而不藻，陶隐能酝藉而不长，圃隐能纯粹而不要，三峰能张大而不检。世称牧隐能集大成，诗文俱优。然多有鄙踈之态，准乎元人之律且不及，其可拟于唐宋之域乎？^③

此外，还有一些笔记，如李陆的《青坡剧谈》、尹耆献的《长贫居士胡撰》、郑东愈的《昼永编》、佚名的《童蒙筮告》等，都保存了不少诗学资料，值得作进一步的搜索。

笔记中的文献也有一个版本问题，使用时应该注意。如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二卷收录的申钦《晴窗软谈》卷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丽朝及我朝皆尚东坡，故丽朝大比，至有“三十五东

坡”之语。近年以来，稍稍不喜，为诗者皆学唐人。²⁹

《韩国诗话丛编》是根据《象村先生集》影印的，《稗林》本的《晴窗软谈》不分卷，但这一段话的内容是一致的。揆诸史乘，“三十五东坡”实当作“三十三东坡”。如《东人诗话》卷上载：

高丽文士专尚东坡，每及第榜出，则人曰“三十三东坡”出矣。³⁰

李璣《松窝杂说》卷下载：

东方科举取人之制，其在三国，则不必问也。丽朝五百年之久，其始未及详知，而中叶之后，只有三年一取三十三人，之外更无别科。我朝亦依前朝。³¹

以上内容，《文献撮录》卷八也作了类似的记载。据《高丽史·选举志》的记载，自忠烈王二年（1276）以后，每科取进士三十三人渐为定制，因此，“三十三东坡”之说应该是此后开始流行于世的。再查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的《象村稿》，其中《晴窗软谈》的这段话，正作“三十三东坡”，可知“三十五东坡”之说为版本之误。版本问题，并非只有笔记中存在，这里只是举例说明而已。

四、选 本

选本是重要的文学史料，在《新唐书》以前，中国的诗文评著作就是著录于“总集”类的。韩国最早的选本，现在可以考知的是崔濯的《东人文》。其书已佚，序文保存在《东文选》中。其编选缘起，一是由于东国自古以来仰慕华风，文章粲然可观，“然而俗尚淳庞，凡有家集，多以手写，少以板行，愈久愈失，难于传广”。二是由于在与中国文士相接时，“间有求见东人文字者，予直以未有成书对。退且耻焉，于是始有撰类书之志。……起于新罗崔孤云，以至忠烈王时，凡名家者，得诗若干首，题曰五七；文若干首，题曰千百；骈俪之文若干首，题曰四六。总而题其目曰东人之文。……欲观东方作文体制，不可舍此而他求也。”³²所以从

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部“集成之书”。后来的若干选本，如《青丘风雅》、《东文选》也都具备汇编东人作品的功能。而中国古代的选本，根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说法，是具有批评功能的，“这可以说是与早期韩国选本的一个差异。

早期韩国选本的编选初衷都有保存文献的目的，因此，它们也就成为研究新罗、高丽朝诗学的基本资料。如赵云伋《三韩诗龟鉴》、金宗直《青丘风雅》、徐居正《东文选》、南龙翼《箕雅》等。未有文集留存下来的诗人，他们的作品有赖这些选本流传至今。以上选本中，最重要者为《东文选》。其《序》中批评道：“金台铉作《文鉴》，失之疏略；崔濯著《东人文》，散佚尚多，岂不为文献之一大慨也哉？”在此之前的《三韩诗龟鉴》仅三卷，《青丘风雅》为七卷，《东文选》多达一百三十卷，诗歌部分占十九卷。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作品，而且在书、序、跋等类中，也保存了大量诗学评论文献。如“序”类有五篇《八家诗选序》，三篇可见于各自的文集，另外两篇则唯见于《东文选》。如无名氏的序评论了入选的李白、杜甫、韦应物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的诗：

不读非圣之书，耻为郑卫之音，驰驱屈、宋，鞭挞扬、马者，谪仙之所以圣于诗者也；上薄风雅之正，下积众家之长，胸吞云梦，气障黄流者，子美之所以集大成也；精深而妙丽，豪纵而不羁，苏州之诗也；幼眇而清妍，言婉而情至，柳州之诗也；文忠则出自胸臆而不见牵强；舒王则用意高妙而操律精严；雪堂之辞格超逸，可一洗乎万古；涪翁之清新奇巧，若珠玉之在旁。^①

高丽诗学，大致经过了初以唐诗为主，继而兼学唐宋，最后崇尚宋诗的过程。这里所透露出来的，便是兼综唐宋的消息。崔恒的《八大家诗序》有所谓“诗自风骚以后，唯唐宋为盛”之语，正可互相参证。

韩国古代的选本从入选对象看，可粗分作三类：即专选本国诗，专选中国诗，兼选中韩诗。朝鲜时代的一些选本，辑存文献的意识不浓，往往体现出一定的选编宗旨。如李珣编《精言妙选》，分作元、亨、利、贞、仁、义、礼、智八集，其《序》曰：

人声之精者为言，诗之于言，又其精者也。诗本性情，非矫伪而成，声音高下，出于自然。三百篇曲尽人情，旁通物理，优柔忠厚，要归于正，此诗之本源也。世代渐降，风气渐淆，其发为诗者，未能悉本于性情之正。……患诗源久塞，末流多歧，学者睢盱眩乱，莫寻其路，乃敢采其最精而可法者，集为八篇，加以圈点，名曰《精言妙选》。以冲淡者为首，使知源流之所自，以次渐降，至于美丽，则诗之络脉，殆近于失真矣。乃以明道韵语终焉，俾不流于矫伪。去取之间，有意存焉。^②

作为朝鲜时期著名的理学家，他的选编宗旨就是要通过阅读诗歌，以恢复性情之正。所以序文之外，又写了《总叙》，对每一集的选编宗旨再三言之，兹录其第一则如下：

元字集曰：此集所选，主于冲淡萧散，不事绘饰，自然之中，深有妙趣。古调古意，知者鲜矣。唐宋以下诸作，品格或不逮古，间有近体，而皆无雕琢之巧，自中声律，故并选焉。读此集，则味其淡泊，乐其希音，而三百之遗意，端不外此矣。^③

有些选本出于御旨，如《杜陆千选》；有些选本则流行于民间，如《百联抄》，从中都可以考察诗风的变化。《百联抄》是一部教授童蒙作诗的教材，从唐宋诗歌中选取一百联诗句，供儿童揣摩效仿。从可考的诗句来看，实以唐诗为主，宋诗中仅有苏轼、王安石、胡宿三人。这也许正表明了诗坛风气由宋诗向唐诗转变。^④

选本中的批点和注释，也是值得注意的诗学资料。韩国最早

的批点，当以《三韩诗龟鉴》为首。其书由崔濯批点，极为简略。如评崔致远《蜀葵花》曰：“公自况。”评《江南女》曰：“若用谩字，尤妙。”^⑤《青丘风雅》的内容就丰富一些。卷首列《诸贤姓氏事略》，往往保存了一些诗人的传记资料。在注释中，则往往将本于中国诗人的诗句表出，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诗学在当时的流传情况。注释之外，也有评论的内容。如评俞承旦《宿保宁县》曰：“公之诗大抵工于锻炼而无斧凿痕。”^⑥又如评李崇仁《新晴》诗曰：

诗意谓灵运“春草”之句，渊明“采菊”之诗，俱是景与意会，偶然成文尔。岂区区乞灵于古人之陈语哉？此公自负之作。^⑦

此后的《国朝诗删》亦有批点或注释，《韩国诗话丛编》将这两种选本收入，当着眼于此。

谈到评点，不能不提到李植的《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》。杜诗在韩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，翻刻、谚解之作颇多，但影响较大的则是李植此书。申纬在其《东人论诗绝句》中写到：“天下几人学杜甫，家家尸祝最东方。时从《批解》窥斑得，先数功臣李泽堂。”^⑧该书除了辑录师古、王洙、蔡梦弼、赵次公、刘辰翁等人的批注外，往往加上自己的评论，或自述见解，或商榷前人，体现出“细读法”的精神。如评论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的“老大意转拙”句曰：

“意拙”二字是通篇眼目，愚字，濩落字，契阔字皆从“拙”字来。又以一进一退为起伏，忧世者进取之意，江海者是退遁之志。^⑨

此下逐句分析其进退之意。虽不免细琐，却有便于初学。其评语体现出的诗学观念多有与朱子或明代前后七子相承继者，这和他的学问渊源及所处的时代也是相关的。李氏批语的内容现已辑出，可参看。^⑩

五、类 书

类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，往往也包含诗学的内容。中国的类书始于魏文帝时期的《皇览》，其后撰述不绝，且多有卷帙宏大者。目前见到的韩国类书都出于朝鲜时代，其中与诗学关系密切者有李睟光的《芝峰类说》、李瀾著、安鼎福编的《星湖僊说类选》、权文海的《大东韵府群玉》、李裕先的《林下笔记》等。由于韩国类书多个人著述，所以一般而言，过于庞大的卷帙，类似于中国的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规模是不存在的。

诗学著述中对类书的注意由来已久，洪万宗《小华诗评》已开始辑录《芝峰类说》的内容。《芝峰类说》凡二十卷，略分天文部、时令部、灾异部、地理部、诸国部、君道部、兵政部、官职部、儒道部、经书部、文字部、文章部、人物部、性行部、身形部、语言部、人事部、杂事部、技艺部、外通部、宫室部、服用部、食物部、卉木部、禽虫部，共二十六部，其中文章部内容最广，占七卷之多，经书部占三卷，合两部共十卷，占全书之半。两相对照，《诗话丛林》仅文章部从卷十三部“东诗”选录了一百一十条，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被排斥在外。《韩国诗话丛编》则收录其六卷，略其评文部分，又收《星湖僊说·诗文门》和《林下笔记·评诗》目。韩国类书中的重要部分已大致收入，可供研究者参考。

但类书中的文献仍有待挖掘，这可以分作两种情况：一是辑而未尽者，一是尚未利用者。前者可以《林下笔记》为例。该书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、典谟、小学、金石、历史、地理、产物、器用、典故、习俗、书画、典籍、诗文、歌词、逸话、遗闻等，总十六编、三十九卷、三千五百六十八目。其与诗学有关者，目前辑出的只是卷一《四时香馆编》中的《评诗》一目，但此外的材料还有很多，如卷二《琼田花市编》的《占歌谣

辞》、《四言古诗》、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、《五言古诗》、《七言古诗》、《近体歌行》、《近体律诗》、《排律》、《绝句诗》、《和韵诗》、《六言诗》、《联句诗》、《集句诗》、《杂体诗》、《杂韵诗》、《杂数诗》、《杂名诗》、《离合诗》、《诙谐诗》、《诗馀》等目，以及卷三十八的《海东乐府》（含一百一十目）、卷三十九的《异域竹枝词》（含三十目）。^①而散见于各卷中的条目也不在少数。同样的情况，在对《芝峰类说》的辑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。

尚未利用的类书，我想举佚名的《野乘》为例。这是李朝后期编纂的一部书，其中《国朝诗家》一目，多能扼要指出诸家的风格特征或诗学渊源。兹略举如下：

金宗直 学苏、黄。

徐居正 富赡。

金时习 超迈。

林亨秀 风流豪逸，诗亦翩翩。

崔庆昌 学唐。^②

此外，书中还往往简单地提供了这些诗人的名号、籍贯、及第、官职等情况，可资参考。

一般说来，类书只是辑录材料，作者本人很少下判断，这是中国类书的通例。然而韩国的一些类书，在博采群书的同时，往往加入自己的考证及见解。上文举到的《芝峰类说》、《星湖僊说类选》和《林下笔记》莫不如此。从诗学文献的角度看，这就不只是一般的资料罗列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本人的诗学观。

六、行 纪

中韩两国自古以来，使者交通往还不绝。朝鲜肃宗朝编写的《通文馆志》，专门记载了其国的外交历史及制度等。据载，高丽忠烈王二年，置通文馆以习汉语；恭让王三年，改为汉文都监；朝鲜初年置司译院。从高丽中叶到朝鲜末，每年都有定期的赴京使

行。《通文馆志》记载了朝鲜朝的情况：

国初，岁遣朝京之使，有冬至、正朝、圣节、千秋、四行、谢恩、奏请、进贺、陈慰、进香等使。……自崇德以来，无千秋使而有岁币使。至顺治乙酉，因敕谕乃并三节及岁币为一行。^④

使者频繁之时，甚至于“前者未还而后者继，循环络绎，无有休息”。^④使者赴燕，往往将其闻见写成纪行录，多以“朝天录”或“燕行录”命名，其内容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典章制度、社会习俗，以及思想学术等诸方面。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在60年代初，曾影印了《燕行录选集》上下卷共三十一一种。除一种外，都是用汉字写作的。现存最早的此类行纪，始于高丽时代，如李穀的《滦京纪行》、李詹的《观光录》，皆为诗体。此下数量繁富，以笔者的收集，就达百余种之多（实际所存当远不止此）。金景善《燕轺直指序》曾作过这样的概括：

适燕者多纪其行，而三家最著：稼斋金氏，湛轩洪氏，燕岩朴氏也。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；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；朴类夫立传而赡丽闳博。

而金氏的写作“则就准于三家各取其一体，即稼斋之日系月、月系年也；湛轩之即事而备本末也；燕岩之间以己意立论也”。^⑤这是从撰述体例上区分，若是从文体上看，燕行录则可分作两类，即韵文和散文。目前影印出版的燕行录多为散文体，但如佚名的《蓟山纪程》、李宜显的《陶谷集·纪行诗》、李时秀的《续北征诗》则均为诗体。至于散见于各种文集里的“朝天录”，更有许多是由诗体构成的，其本身就是诗学文献。而像柳得恭的《热河纪行诗注》，则可以說是韵文和散文的结合体。

据《正祖实录》所录使者赴清必须遵循的条律，其中之一如下：

使行渡江后，约束一行军官书记，凡系物货交易、盘缠

与受外，毋得与彼人亲昵往来，笔谈唱和，书札问讯。土产赠遗等节，另加禁断。如有犯者，书状官还渡江后，以冒禁律状闻论勘。书札赠遗时，居间象译，搜检时亦为摘发，绳以重律。^⑩

然而事实上，在此前后的朝鲜使者到了中国，由于使者本人或随行中颇多文人学者，所以与中原的文人学士广泛交游，多有“笔谈唱和，书札问讯”。尤其是乾隆朝的燕行录中，此类内容极为丰富。如洪大容《湛轩燕记》“吴彭问答”、“蒋周问答”、“刘鲍问答”、“乾净笔谈”等；朴趾源《热河日记》中的“栗斋笔谈”、“商楼笔谈”、“鹄汀笔谈”、“玉匣夜话”等；朴齐家《缟紵集》则附有他与李鼎元等十五人的笔谈，和纪昀等人的唱和诗以及往返书札；柳得恭《冷斋书种》又名《并世集》，录中国六十七人唱和赠答诗，以及日本十人、安南五人、琉球五人的唱和赠答诗。卷末还列其交游姓名。其序文尤其值得注意：

我东之于中国，隔辽一野，间渤一海，名虽外国，而比之云、贵诸省，至相近也。只缘限之以疆场，别之以内外，则虽并一世，邈若千秋。……岂不大可哀哉？在昔崔致远、金夷吾之于顾云、张乔也，李仲思、李中父之于虞、赵、黄、揭也，咸能联镳并驱于词翰之林，唱醉篇章，至今照烂人目，此千百载数人尔。……十数年来，同志数子，莫不涉马觔踔辽野而游乎燕中，所与游者，皆二南十三国之地之人，或翱翔馆阁，或放浪江湖，其风流文物，足以掩映当世，而其为诗也，飒飒然雅颂遗音，必传于后。^⑪

他是将自己的工作，上比于“崔、金、二李之流风馀韵”。行纪中除了到中国者以外，还有一些是出使日本的记载。由于同属于汉文化圈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也都是借助于用汉字笔谈，所谈的内容也往往有关于诗。例如，申维翰的《海槎东游录》四卷、《海游闻见杂录》二卷，其中多有关涉到中国和日本的文学史料，

如后者即专列“文学”一目。人们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，十分重视“媒介”的作用，这些文献就是最生动的文学交流生活的记录，可惜关注者不多。

行纪中的诗学资料，虽然也有学者注意，却仍不很充分。如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十一卷收录的朴趾源《杨梅诗话》，就出于其《热河日记》。但《热河日记》中的诗学资料并不限于题名“诗话”者，如卷四《避暑录》中就有相当丰富的资料。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对中国人评论韩国汉诗的辨正，中韩诗学关系史料，《全唐诗》中的佚诗，对清代诗学的看法等。又如朴长蘅纂辑的《缙绅集》，其凡例曰：

此书始于《巾衍集》，终于《贞蕤稿略》。横之为纬，竖之为经。可以谓诗话，亦可以谓题襟。^④

再如《湛轩燕记》中的《乾净笔谈》，洪大容与严诚、潘庭筠等人的谈话，亦颇涉诗学。如关于妇女为诗的问题，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对话：

兰公曰：“东方妇人能诗者乎？”余曰：“我国妇人，惟以谚文通问讯，其父母未尝使之读书识字。况能诗尤非妇人所宜，是以或有能之者，闻之者不以为奇，故亦不敢闻世。”兰公曰：“中国亦绝少能诗者，而或有之，则仰之若庆星景云。”力闇曰：“他之夫人能诗，故其言如此。妇人能诗，岂是好事？”因向余诵“无非无仪，惟酒食是议，无父母贻罹。”兰公曰：“然则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非圣女之诗乎？”余曰：“有圣女之德则可，无圣女之德则或归于荡，此则闇兄之论甚正，兰兄之琴瑟和鸣，乐则乐矣，比之庆星景云则过矣。”兰公曰：“贵国景樊堂许筠之妹，以能诗，名入于中国选诗中，岂非幸欤？”余曰：“女红之余，傍通书史，服习前训，行修闺阁，实是妇人之高处。若修饰文藻，以诗律著名，恐终非正法。”^⑤

清代女学兴盛，妇女为诗者益众，对妇女为诗的看法也有所转变，

乾嘉以来，人们不仅欣赏妇女诗，而且从理论上对“妇女不宜为诗”加以驳斥，甚至在文学上出现“夫以妇传”的情况。^⑤而朝鲜长期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，在妇女为诗的观念上就显得比较保守。这些笔谈的资料，多为朝鲜人带回，如《湛轩燕记》卷四《橐装》历举归国行囊之物，其中就有“七次笔谈原草一轴”。韩国历代燕行录的文献价值（不只是诗学方面），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。

七、史 书

史书的位置很高，在四部分类的图书中仅次于经部。韩国的史书种类颇多，即以《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》所分，就有“正史类”、“编年类”、“纪事本末类”、“别史类”、“杂史类”、“史表类”、“钞史类”、“诏令·奏议类”、“传记类”、“谱系类”、“职官类”、“政法类”、“产业类”、“地理类”、“书志类”和“金石类”等。其中与诗学关系较多者，主要是正史、编年史和地理书等。

中国自司马迁开始，就在史书中摘录传主的作品。后人修史，每相沿袭。韩国史书中的正史，首推金富轼的《三国史记》。这部书记载了从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三国鼎立到统一新罗时代的历史。如上所说，现存最早的韩国文集是新罗末期崔致远所作，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弥足珍贵。《东文选》卷四录无名氏《织锦献唐高宗》一首，但是据《三国史记·新罗本纪·真德王》的记载，此诗是真德王四年（650），由女王“织锦作五言大平颂”。在中国的文献中，《旧唐书·东夷·新罗》也有同样记载，但颇有异文。总之，这一记载可补《东文选》之阙。不仅如此，史书中有时还可补中国文献之不足。如《新罗本纪·景德王》记载唐玄宗赐景德王五言十韵诗一首：

四维分景纬，万象含中枢。玉帛遍天下，梯航归上都。缅

怀阻青陆，岁月勤黄图。漫漫穷地际，苍苍连海隅。兴言名义国，岂谓山河殊。使去传风教，人来习典谟。衣冠知奉礼，忠信识尊儒。诚矣天其鉴，贤哉德不孤。拥旄同作牧，厚赐比生刍。益重青青志，风霜恒不渝。

此诗不见于《全唐诗》，故朴趾源《热河日记·避暑录》据此指出：“后世录唐诗者并未见收，始知前代坠文，非耳目所可穷。而海外偏邦之士，反或有阐幽之功，岂非吾辈之厚幸欤？”⁵¹日本河世宁《全唐诗逸》曾据《东国通鉴》补入，略有异文。这也正反映了史书中诗学文献的重要。

《高丽史》是韩国正史中另一部重要之著。从诗学的角度看，《乐志》是最值得重视的。其中分作三个部分：雅乐、唐乐和俗乐。雅乐是祭祀和宴享之乐，俗乐是高丽固有之乐，唐乐则是从中国输入的教坊乐。特别是唐乐中引用了大量宋人的词作，以及对于这些作品在乐谱上的说明，不仅有助于了解高丽时的音乐状况，而且可以藉此资料纠正一些流行的谬见。例如，长期以来，人们习惯于将词学上的令、引、近、慢与词的字数相关联，如清人宋翔凤《乐府余论》指出：“令者，乐家所谓小令也；曰引、曰近者，乐家所谓中调也；曰慢者，乐家所谓长调也。”但如果根据《高丽史》的记载，则可以知道，这些术语的原意指的是随着音乐体段、节奏、以及演唱上的特点而形成的区别。这一文献的重要性，在中外音乐和词学研究者中已经引起较多的注意。⁵²

《朝鲜王朝实录》属于编年史，其中所录大臣的一些札启中，往往透露出一些与诗学有关的消息。例如，《成宗实录》卷二八五成宗二十四年（1493）十二月戊子载弘文馆副提学金谏等上札子曰：

伏闻顷者李克墩为庆尚监司、李宗准为都事时，将所刊《酉阳杂俎》、《唐宋诗话》、《遗山乐府》及《破闲》、《补闲集》、《太平通载》等书以献，既命藏之内府，旋下《唐宋诗

话》、《破闲》、《补闲》等集。……臣等窃惟帝王之学，潜心经史，以讲究修齐治平之要，治乱得失之迹耳，外此皆无益于治道，而有妨于圣学。克墩等置不知《杂俎》、《诗话》等书，为怪诞不经之说，浮华戏剧之词，而必进于上者，知殿下留意诗学而中之也。人主所尚，趋之者众，克墩尚耳，况媒进者乎？若此怪诞戏剧之书，殿下当如淫声美色而远之，不宜为内府秘藏，以资乙夜之览。请将前项诸书出府外藏，以益圣上养心之功，以杜人臣献谀之路。

以上所举诸书，《破闲集》、《补闲集》为高丽时期的诗话，《唐宋诗话》则为宋代的诗话，全称《唐宋分门名贤诗话》，在中国久已亡佚。金谔等人劝成宗勿读此类书，但成宗“留意诗学”、“喜诗话”，依然如故。《唐宋诗话》二十卷，今存十卷于韩国，乃姜龟孙（用休）为尚州牧使时刊行，当在1491年。⁵³由此看来，此书的刊行可能与成宗的喜好有关。宋人的这部诗话在中国久佚，而能在韩国保存至今，或许也得益于成宗的爱好。

中国的地理书一向注重人文地理，如宋代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、祝穆《方舆胜览》等，《四库提要》评论后者“诗赋序记，所载独备。……虽无裨于掌故，而有益于文章，摘藻挾华，恒所引用，故自宋元以来，操觚家不废其书焉。”⁵⁴其引用诸家诗文，据卷首列目，就有近三百家、近二千篇之多。《东国舆地胜览》即沿袭其旧式，书中载录了大量有关舆地的诗文。据李荇《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序》称：“尊而庙社陵寝，严而宫阙官府，学校是教养之地，土产乃衣食之原，论人物则孝子烈女为之纲，语形胜则城郭山川为其要，以至楼亭寺社，驿院桥梁，名贤事迹，骚人题咏，纤细微隐，靡不备录。”⁵⁵所以，地理书中往往保存了一些诗人的遗文佚作。例如，该书曾引用崔致远的作品若干首，其中有一首绝句：“襟带江山似画成，可怜今日静消兵。阴风急卷惊涛起，犹想当时战鼓声。”就是《桂苑笔耕集》和《孤云先生文集》所不载者。⁵⁶这

样的例子是并不少见的。

以上列举了诗话、文集、笔记、选本、类书、行纪、史书等七类书籍，综述了韩国的历代诗学文献。不难发现，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宝藏。如果将这些文献予以系统整理，并将这一工作扩展到日本和越南的汉籍，则立足于汉文化圈的中国文学乃至汉语文学研究，一定会出现崭新的面貌。

注：

①朝鲜时代沈光世《海东乐府序》指出：“吾东虽曰好学，学者所习，惟在中国书籍。东国之书，漫不识其题目。”《休翁集》卷三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。汉城：景仁文化社，1996年12月版。

②《小华诗评》卷之上。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三卷，页424。汉城：太学社，1996年5月版。

③同上，页493。

④王士禛《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》之二十九：“‘澹云微雨小姑祠，菊秀兰衰八月时。’记得朝鲜使臣语，果然东国解声诗。”《渔洋精华录集注》卷二，页256。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2年1月版。

⑤纪昀《怀朴齐家》之一：“偶然想见即相亲，别后匆匆又几春。倒屣常迎天下士，吟诗最忆海东人。”《纪晓岚文集》第一册卷十一，页530。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7月版。

⑥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诗话》指出：“诗话之源，本于钟嵘《诗品》。然考之经传，如云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’又云：‘未之思也，何远之有？’此论诗而及事也。又如‘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’‘其诗孔硕，其风肆好。’此论诗而及辞也。”《章学诚遗书》本，页43。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8月版。

⑦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一卷，页397—398。

⑧《白云小说》最早见于洪薰宗编《诗话丛林》，据其序文可知，洪氏編集《丛林》时已有此书。其文共三十一则，有六则不见于《东国李相国集》，第十一则和三十一则的部分内容也不见于文集，颇滋疑问。如第一则引《尧山堂外纪》，为明人蒋一葵所撰，时代不相及，柳在泳《白云小说研究》（圆

光大学校出版局，1979年8月版）认为乃朝鲜时代人辑入。丁奎福《韩国古典文学的原典批评研究》（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出版部，1992年6月版）则推测为洪万宗编纂。

⑨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一卷，页79。

⑩《四佳集·文集》卷四《东文选序》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。

⑪崔淑精《东人诗话后序》，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一卷，页537。

⑫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五卷，页21。

⑬据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（太岁）在壬曰玄默。在辰曰执徐。”明亡后，“凡官文书外，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。”（《肃宗实录》卷三）如朴趾源《热河日记·渡江录》曰：“皇明中华也，吾初受命之上国也。……清人入主中国，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。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，独守先王之制度，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之东也。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，肃清中原，以光复先王之旧，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。”即为一例。

⑭《水村集》卷九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。

⑮《白云小说》曰：“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，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。”（《诗话丛林》卷一）成倪《慵斋丛话》卷一曰：“我国文章，始发挥于崔致远。”洪万宗《小华诗评》卷上曰：“崔致远文体大备，遂为东方文学之祖。”

⑯崔滋《补闲集序》，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一卷，页79。

⑰中国古代的论诗诗以绝句为主，参看郭绍虞、钱仲联、王遽常编《万首论诗绝句》。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1年2月版。

⑱《东国李相国集·后集》卷一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。

⑲《警修堂集》十三《北辕集》卷一。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河合文库藏本。

⑳王若虚《滹南诗话》卷上引周昂论诗语曰：“文章以意为主，字语为之役。主强而役弱，则无使不从。”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8月版。

㉑金泽荣《杂言六》指出：“申紫霞之诗以神悟驰骋，万象具备，为吾韩五百年之第一大家。”《重编韶濩堂集精》本卷六。南通：翰墨林书局，民国十三年版。

㉒《文史通义·诗话篇》。

㉓《朝鲜图书解题》，朝鲜总督府编纂，昭和七年八月版。

②④《东野汇辑》卷首。

②⑤《大东野乘》本卷一。朝鲜古书刊行会，明治四十三年版。

②⑥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二卷，页587。

②⑦同上第一卷，页444。

②⑧《稗林》本。汉城：探求堂，1971年9月版。李璽之说有不确者，据《高丽史·选举志》的记载可以订正其说。首先，科举制的施行并非三年一次，即使在高丽中叶以后，仍然是“或比年，或间岁，未有定期”。其次，进士科不是唯一的科目，《选举志》载：“其科举有制述、明经二业。而医、卜、地理、律、书、算、三礼、三传、何论等杂业，各以其业试之而赐出身。……而科目之外，又有遗逸之荐，门荫之叙，成众爱马之选补，南班杂路之升转，所进之途非一矣。”中叶以后，尚有明经、恩赐，也是及第之一途。

②⑨《东人文序》，《东文选》第四册卷八十四，页349。马山：民族文化刊行会，1994年3月版。

③⑩《隋书·经籍志》集部序：“总集者，以建安以后，辞赋转繁，众家之集，日以滋广。晋代摯虞，苦览者之劳倦，于是采摘孔翠，芟剪繁芜。自诗赋下，各为条贯，合而编之，谓为《流别》。是后文集总钞，作者继轨，属辞之士，以为覃奥，而取则焉。”

③⑪《东文选》卷九十五。

③⑫《栗谷全书》卷十三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。

③⑬《栗谷全书·拾遗》卷四，《韩国文集丛刊》本。

③⑭参看张伯伟《朝鲜古代汉诗总说》，载《文学评论》1996年第二期。

③⑮《三韩诗龟鉴》卷上，页4、5。《高丽时代汉诗文学集成》第六卷。汉城：民昌文化社，1994年3月版。

③⑯《青丘风雅》卷三，《韩国诗话丛编》第二卷，页245。

③⑰同上，页380。《新晴》诗曰：“为爱新晴倚草亭，杏花初结柳条青。诗成政在无心处，枉向尘编苦乞灵。”

③⑱《警修堂诗集·北禅院续稿》卷一。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河合文库本。

③⑲《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》卷三，康熙十八年朝鲜李氏家刊本。

④⑩参看张伯伟、左江《朝鲜李植〈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〉评语辑录（上）》，载《中国诗学》第五辑。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7月版。其余部

分将陆续刊出。左江又以此书为对象撰为硕士论文，对其评点有较为细致的分析。

④①此据成均馆大学校影印本，1961年12月版。

④②抄本，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河合文库藏。

④③《通文馆志》卷三，页23。汉城：民昌文化社，1991年8月版。

④④《成宗实录》卷一九九。

④⑤《燕行录选集》上卷，页933。汉城：成均馆大学校，1960年8月版。

④⑥《正祖实录》正祖十一年十月甲辰条。

④⑦《燕行录选集》上卷，页615。

④⑧《楚亭全书》下，页6。汉城：亚细亚文化社，1992年4月版。

④⑨《湛轩燕记》卷五，《燕行录选集》上卷，页381。

⑤⑩参看曹虹《清代常州女学与阳湖文派》。载《学人》第七辑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5月版。

⑤⑪《燕岩集》卷十四，页280。汉城：景仁文化社，1966年5月版。

⑤⑫可参看以下文献：日本内藤虎次郎《宋乐と朝鲜乐との关系》，载《支那学》第四卷，1928年；韩国车柱环《高丽史乐志唐乐考》，载《震檀学报》第二十三号，1962年12月；韩国金学主《高丽史乐志“唐乐呈才”之考注与问题》，载《亚细亚研究》第X卷第四号，1967年12月；谢桃坊《〈高丽史·乐志〉所存宋词考辨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1993年第二期。

⑤⑬参看赵钟业《韩国诗话研究》第三部第九章，页486—488。汉城：太学社，1991年2月版。

⑤⑭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八，页596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6月版。

⑤⑮《新增东国輿地胜览》，页4。汉城：明文堂，1994年8月版。

⑤⑯朴鲁春《崔致远诗作品数小考》指出《东国輿地胜览》中有两首新发现的诗（文载《东洋学》第五辑，1975年6月），但其中所引的一首律诗已见于《孤云先生文集》，题作《寄颢源上人》，第七句所缺一字，可据《东国輿地胜览》补。

（本成果得到南京大学人才引进培养基金资助）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